

从《藏书》《续藏书》看李贽的史学理念

□ 张燕红

《藏书》《续藏书》是明代李贽的主要著作。李贽一生写下了大量的史学著作，其中最重视的是《藏书》，自称“此吾精神心术所系，法家传爱之说”。李贽自知此书与世不相宜，说“吾姑书之而姑藏之”，以俟夫千百世之下有知我者”，故取名为《藏书》。

《藏书》共68卷，取材于历代正史，用纪传体裁录了自战国至元末的历史人物约800名。李贽按自己的观点把这些历史人物加以分类，对一些类目写了总论，对一些人物、事件和言论写了专论或简短评语，评论尖锐、泼辣，富于批判精神。《续藏书》为《藏书》的续集，由王维俨于李贽去世7年后刊，共27卷，主要取材于明代的人物传记和文集，载录了明神宗以前明代人物约400名。《藏书》《续藏书》中，李贽对史书体例和编排进行了创造，对载录的历史人物做了与传记见解不同的评价，集中体现了李贽的史学理念。

昭彰事实，垂鉴后世：对史书体例的创造。李贽在史学理念方面的首要贡献，在于他第一次明确地从经学“祛魅”的角度，提出并论证了“六经皆史”“经与史相为表里”，主张历史学研究应史论结合，注重揭示兴亡治乱的规律，以更好发挥其“昭彰事实，垂鉴后世”的社会功能，为“志在救时”的实践目的服务。

遵循着史论结合、昭彰事实、垂鉴后世的思路，李贽在史书体例上有一个重要创造，即把“本纪”与“世家”合二为一，创造“世纪”体。这一创造，打破了传统的“书君上以显国统”的“本纪”体例，有利于人们从历史中总结经验教训，获得“治平之事与用人之方”的启迪。一方面，那些虽然失败却影响过历史进程的英雄人物，纷纷被写入了“世纪”中。如陈胜和项羽，李贽专门为其写了传记《匹夫首倡》和《英雄草创》。另一方面，《藏书》《续藏书》着重记叙在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帝王的事迹，不是任何帝王都可以在“世纪”中占有一席之地。如西汉，主要记述了汉高祖、汉文帝、汉武帝、汉昭帝、汉宣帝五位帝王的事迹，至于元、成、哀、平诸帝，则被认为“此不足称帝矣”，附于宣帝之下一笔带过。

《藏书》的列传部分也与传统的纪传体史书的体例在分类上有很大不

同，其列传分为大臣、名臣、儒臣、武臣、贼臣、宗臣、近臣、外臣八大类。从《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后论》的说明来看，列传各类编排的顺序，即形成历史由治而乱的过程。李贽认为儒臣为治终乱始的关键，其云：“儒臣实不可以治天下国家。”在举用儒臣前，治世有大臣、名臣，无论君王是否为圣明之主，举用大臣便得以辅天下而至太平，使百姓得到安养。名臣虽未必知学然实有学者，凭其才能可至守成治世之功。李贽所谓之儒臣，其功皆在文学，故无益于天下，又以明哲保身处世，故天下无臣之事功，便日渐衰退至乱世。世乱则武臣必出，贼臣觊觎天下，宗臣、近臣谄佞于君臣之间以取其利。天下至于大乱，大臣无所作为，隐于江湖，是以外臣为终。从《藏书》的这一史学体例来看，李贽的根本宗旨就是要从历史事实中总结中国历代王朝从兴盛走向衰落的规律性，探求国家富强的道路。

道不虚谈，注重实效：以事功为主的记载。《藏书》《续藏书》中，李贽判断是非的标准以实效为准，而非道学者所依据的圣门古训。他在书中开宗明义地反对以孔子的言论为判断是非的标准；他高度赞扬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功绩，称其为“千古一帝”；他赞赏法家革新进步的思想，给予著名法家人物及具有改革理念的政治家比较高的评价。李贽说：“夫当行而后言，非通于道者不能；可行而后言，非深于学者不能……真所谓通于道、深于学者也，故能洁己裕人，公恕并用，其言之而当行而可行者乎……实学也。”可以看出，李贽的“实学”理念包含了“当行”和“可行”两种属性，体现了“道不虚谈，注重实效”的标准。

《藏书》《续藏书》中对于人物、事迹的记载皆是以事功为主，由其篇幅之长短可见其事功之多寡。例如，在世纪对于历代君王的描述，事功如汉武帝者，其篇幅颇长，且所举皆为武功；无事功如汉元帝者，篇幅很短，甚至仅一笔带过，无从记录。由此可见，《藏书》《续藏书》中历史人物之定位，取决于事功的高低。

李贽把“童心说”推广和运用于历史学研究领域，提出了“论赞须具旷古只眼”。他总是把有真才实学的士大夫和正统儒者对比，《藏书》对

儒臣的批判无所不在。《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后论》云：“呜呼！受人家国之托者，慎无刻舟求剑，托名为儒，求治而反以乱。而使世之真才实学，大贤上圣，皆终身空室蓬户已也。则儒者之不可以治国家，信矣。”李贽说《藏书》“潜凿皆治平之事与用人之方”，这段话正是他对《藏书》的理论总结。

民贵君轻，以质救文：对治乱循环的突破。“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循环在中国历史上一再上演。李贽在《藏书》中展现了对这种治乱循环的表述：“一治一乱若循环。自战国以来，不知凡几治几乱矣。”他认为自战国以来，中国朝代便在治乱之中不断循环，而造成治乱的主因为“文”与“质”的消长。《世纪总论》说：“夫人生斯世，惟是质文两者。两者之生，生于治乱。其质也，乱之终而治之始也，乃其中心之不得不质者也，非矫也。其积渐而至于文也，治之极而乱之兆也，乃其中心之不能不文者也。皆忠也。”

李贽认为，历史治乱循环不断，乃在于君臣不能守其质朴本心。因此，李贽提出“以质救文”，希望能挣脱治乱循环的必然。李贽所强调的君臣之事功，其在于能够使天下百姓得到安养。李贽认为百姓是国家的基础，君臣的作为皆需从百姓出发，因此不可有为一己之私欲的奢靡行为。从历代治乱循环的观察，凡君王能守其质朴本心者，其能以国家为己任，用心之处皆为百姓安居乐业、民心归顺，政策自然通行，危乱无从发生。

审时度势，适时变通；识主建功的时势相对论。求变是李贽《藏书》的主旨之一，他在《藏书·世纪列传总目》中提出了两个命题：一是“如岁时然，昼夜更迭，不相一也”；二是“昨日是而今日非矣，今日非而明日又是矣”。时移则事移，不同的阶段，是非标准也应随之更迭。因此，李贽青睐那些审时度势适时变通的士大夫们。

李贽在历史治乱循环的观察中了解到，圣贤之君不可常遇，因此在一质一文变易中，治乱随之嬗替。为顺应此种变易，李贽认为应适时变通，以求得其利，建功于天下国家。《秦始皇帝传》云：“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李贽于其下评点曰：“‘各以

治’三字甚可贵。”李贽以三代圣王之治表示顺势之重要，他认为时势是相对而生，因此不能受制于定法，为臣者居于朝必不能以安其身为满足。《德业儒臣后论》云：“虽有孔子之圣，苟无司寇之任，相事之摄，必不能一日安其身于鲁也决矣。此自然之理，必至之符，非可以架空而臆说也。”李贽借由孔子表明，为臣者所事之君、所处之势，应能展其才识，得以为之建功。若只是安然于朝，不得其用，则应断然罢去，归顺于明主以求用。即使是圣人，也是在审时度势适时变通中成长起来的。

遇邦无道，吏隐为终：自我理想的寄托。《藏书》是李贽于晚年的发愤之作，此时期李贽的史学理念已臻成熟，人生历练积累丰厚，因此无论是社会观察或历史观察，都有其深刻的思考。然碍于明代的政治风气与李贽作风相斥，其抱负无处伸展，是以寄托《藏书》《续藏书》，借由历史的舞台展现其理想。从他对外臣传》人物的评论可见，李贽认为人既有才，则应为朝政建立事业，以安养天下百姓。但若是形势迫于不遇明主，则隐于江湖待明主而出。

据历史循环论，一质一文终致一治一乱，《世纪总论》云：“天下乱则贤人隐，故以外臣终焉。”天下乱则无道，贤人不得用则隐。有志之贤臣出走，徒留求名之儒臣，已然是国家衰亡之势，因此李贽以外臣为治乱之终。李贽将外臣分为时隐、身隐、心隐、吏隐。李贽认为有才之人皆待贤君举用，因此外臣隐于外是有其不得不隐之因。时隐外臣者，见君无用人之明，具真才实学之贤人，因时不得其势则隐于江湖，以保其全身。李贽认为所学所为一旦陷于名利之中，误以得名即是有德，而专学于名，反不知有具体作为，是失其本性。李贽《藏书》以吏隐为终，是德行合一的最佳表现，亦是其史学理念的最高原则。



“新体制”。创建实战体制，坚持一切为战、一切向战，打造一体化指挥平台、专业化保障支柱、体系化实战团队，全面释放战斗力合力。创新管理体制，推动垂直管理向扁平化、工作管理向板块化、功能管理向实战化、手段管理向网数智能化、队伍管理向红专化转变，更好适应重大斗争需要。

做全法治保障，充实对敌斗争“武器库”。健全国内法治，完善重点领域、新兴领域立法，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工作专业化规范化建设，构建立法执法司法普法并进的法治布局。健全涉外法治，完善涉外法治工作战略布局，增强涉外执法司法效能，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手段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水平。

做好科技保障，打造新质战斗力“增长极”。做强网络化，打造网络尖端技术，提升依托网络技术维护国家安全能力。做优数据化，统筹“算力算力算法”建设，以数为“媒”促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能力提升。做快智能化，实施智能化发展战略，推进技术交流共享，加快生成新质战斗力。

做活宣传保障，奏响大国长安“最强音”。善抓宣传节点，依托“4·15”“1·10”，持续营造全民维护国家安全的浓厚氛围。优化宣传内容，深挖国安题材“富矿”，生动诠释国安战线的“神秘”工作、“神奇”事业、神圣使命。夯实宣传阵地，加强国家安全部官微等新媒体建设，共同唱响维护国家安全的主旋律。

做实队伍保障，锻造又红又专“主力军”。筑牢“红”的根基，深入开展党纪学习教育，着力攻克隐蔽战线加强监督的独有难点，做到坚定纯洁、让党放心、甘于奉献、能拼善赢。提升“专”的能力，教育引导广大干部加强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斗争磨炼、自律修炼，努力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国安铁军。

黄宗羲是浙江余姚人，我国明末清初杰出的文学家、经史学家、地理学家和天文历算学家，被誉为清代“浙东学派的鼻祖”，在实学传承、民本思想、社会治理和自然科学等领域作出诸多开创性的贡献。黄宗羲思想是中华文化滋养和东西文明激荡下的自然产物，其思想的改革性、开放性和对话性超越了地域和语言的限制，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广泛的传播和关注。

观照现实世界：经世致用的实学传承

浙学有关关注民生、切于民用，倡有用之学的优良传统，胡瑗主张“明体达用”，王阳明发明“亲民之实学”，刘宗周“重工夫之实践”，黄宗羲在“致良知即是行良知”等哲学命题的讨论中，发展出“力行之实学”。明清之际的实学思潮中，黄宗羲是疾呼“通经致用”的旗手式人物。他治学遵循“经世致务”的宗旨，将财赋、捍边、作文、政事都列入经世实学，倡导教育要体现和融入改造世界和观照社会的实学知识。在他看来，一切涉及国计民生的“实用之学”都可称之为“绝学”。梁启超把发扬“经世致用”学说的殊荣颁给了以顾炎武、黄宗羲和王夫之为代表的思想家群体，他认为继阳明之后，这一群体再次为儒家找回观照现实的主心骨。

《四库全书》评论黄宗羲：“按诸实际，推究事理，不为空疏无用之谈。”法国汉学家谢和耐充分认同黄宗羲经世致用的精神，他指出，复社成员中真正知晓天文、算学，且在制历、造炮、领军、戍边等事务有所建树的只有方以智、黄宗羲、顾炎武等人。

16世纪前后，以科学和宗教为核心的西学进入中华大地，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浙东学者参与到与西学的对话潮流中，他们追求治学“有益于民生日用”，将西方输入的科技视为“实心实学”，以期改变当时疲敝的社会现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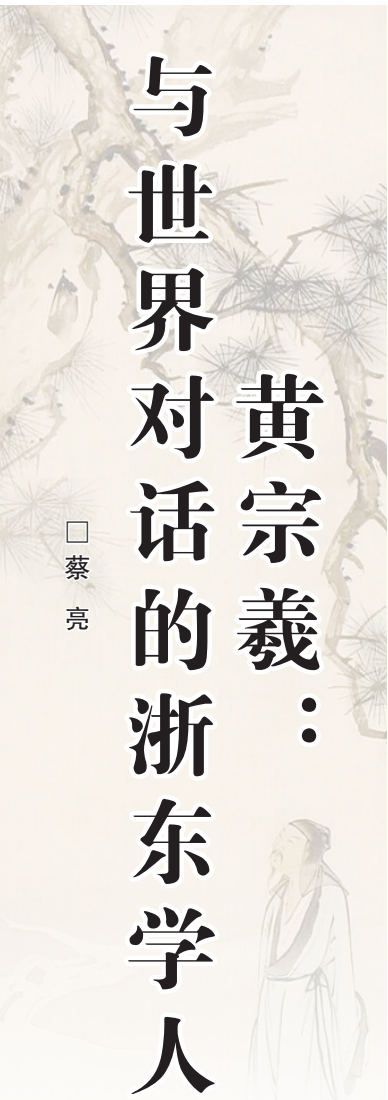
探索自然世界：汇通中西的科学思想

明清之际，东西交汇的夏夷之辨在思想界、知识界蔓延。黄宗羲在传承王阳明和刘宗周学说中，深入地调查研究自然现象和社会问题。一方面，他批判西方对中华知识，如勾股之学改头换面的攫取，发出“殊失深渊，罔象得之”的感慨。另一方面，黄宗羲系统研治天算和西洋历法，以开放的胸襟与以汤若望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展开学术交游，并曾为其作诗“为吾发其凡，由此识阡陌”。黄宗羲在批判中吸收，肯定以实证为基础的西学科技“为历算学开辟了新道路”；先后撰《西洋历法假如》《回回历法假如》《大统历辨》等历算学著作总计16种。他融通了中国哲学的理气之说，在文化交融中展现出主体性和民族文化自信。

1867年，汉学家、数学家伟烈亚力在《中国文献纪略》中介绍了黄宗羲关于中国古代纪年的《历代甲子考》：“该书主张采用《汉书》的纪年方式，而反对《史记》的纪年方式，《史记》与其前代的纪年方法不同。”《历代甲子考》收录于黄宗羲的《易学象数论》。象数学本是中国古代哲人认识自然世界的规律总结，从宋代开始，理学家们逐渐脱离实际天象观察，黄宗羲批评这种风气“不可施之实用”。他在《原象》中以星象解释《乾卦》，认为苍龙七宿并非主观臆断，而是有现实依据的天文知识。1909年瑞士汉学家、天文学家德沙索以“龙星群”这一概念命名苍龙七宿。1997年，美国汉学家夏含夷在《孔子之前：中国经典诞生的研究》中指出中国神话中龙的独特象征蕴含是基于自然现象的观测。2013年，美国汉学家、天文考古学家班大为在《中国早期的星象学与天文学》中亦用“龙星群”解释《乾卦》学说，认同这是对天体运行变化的考察。

改造儒学世界：经天纬地的实践哲学

黄宗羲反思宋明理学空谈心性、鄙视事功，倡导“儒者之学，经纶天地”的精神。黄宗羲的象数研究是将“切近民用”的大学问重新纳入儒者个人心性涵养的儒家真学问的轨道上，代表了他应用天文学知识指导生产实践的思想。儒家实践哲学的智慧深受西方哲学家的推崇，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天文和历法一直是“正统”的儒家之学。李约瑟从科学史的维度审视这一特质在儒学演变中的发展。黄宗羲《明儒学



案》《宋元学案》梳理儒学脉络、评议心学风演变发展引起了李约瑟的高度关注。李约瑟完全采信了黄宗羲关于陈白沙和王阳明的学理之别。在李约瑟看来，针对社会关系的道德学只强调对自我主体生存的关注，而忽视了个体与客观世界的关联。他感慨，无论思想多么崇高，都对自然科学的发展无益。

中国传统文化之优秀在于其动态的发展和持久的自我更新，改革惯性和实践哲学特质是这种文化的基因和标识。1726年，德国哲学家沃尔夫以《中国智慧重新审视自己的成名之作《普遍实践哲学》，更加深刻地理解实践哲学是“从人心深处抽出指导行为的智慧原则”。《明夷待访录》被众多学者视为儒家实践哲学的代表作。狄百瑞认为《明夷待访录》蕴藏着黄宗羲对儒学实学性、包容性发展的更大贡献。黄宗羲以“理学”概括他所发展的宋明新学问，在美国汉学家狄百瑞看来，“理学拥抱了这些思想的全部；它不应只认同任何一个学派。”这也奠定了西方学者对“新儒学”的界定，包括了理学和心学，包括了形而上学和经世之学。黄宗羲理学定义，比任何其他他道学的狭隘定义，更接近西方流行的对新儒学的理解。

对话文明互鉴：黄宗羲思想的国际传播

1953年狄百瑞翻译出版《明夷待访录》。此后，英语世界对黄宗羲的关注度呈现持续增长，美国汉学家魏伟森等人以博士课题研究黄宗羲，视角包括新儒家哲学、政治观研究、实学研究、经济伦理学研究、士人观研究，推动了世界范围内黄宗羲思想研究的多元化趋势。东亚一直是黄宗羲思想研究的重镇，进入21世纪，日本学者重在梳理黄宗羲思想源流发展。日本德川时代的儒学家荻生徂徕从黄宗羲《明夷待访录》追溯宋舜水思想渊源。日本儒学家正田启佑讨论李贽与黄宗羲的关联。韩国学者从多维视角观察黄宗羲思想的现代转化，包括谈黄宗羲的执政思想以及权力制约论，还有论儒家思想中作为公共行为主体的君子等。

从东西文明交汇的视野下审视黄宗羲思想是学界长久的共识。梁启超在比较分析了黄宗羲和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之后，称《明夷待访录》为“人类文化之高贵产品”，自此，黄宗羲“中国的卢梭”的美誉为世人所熟知。日本学者小岛毅更进一步定义黄宗羲为“东方的卢梭”，同时，他认为卢梭的著作晚于黄宗羲，称其为“西欧的黄宗羲”更合适。

黄宗羲一生推崇“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汇通精神，对于学人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有巨大的启示：一是坚持实学本质，发扬自古至今“中学西用”创新思维；二是坚持中国立场，弘扬沟通中外“西学中用”的开放思维。



（上接1版）

深入推进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举措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总体”一词，揭示出系统观念的思维方法。我们要善于运用总体国家安全观蕴含的科学立场观点方法，抓实抓好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举措。

全体系构建，增强国家安全的整体实力。体系对抗是当前国家安全斗争的基本特点。要着力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建设，坚持党中央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完善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完善国家法治、战略、政策、风险监测预警体系等，构建全域联动、立体高效的国家安全防护体系。

全领域防控，拓展国安工作的宽广视野。当前，国家安全的领域更加宽广，影响国家安全的因素增多。要树牢大安全理念，既维护政治、经济、军事等传统安全，又防控好生物、数据、人工智能等非传统安全，既高度警惕“黑天鹅”，也防范“灰犀牛”，推动完善国家安全工作布局，把各领域国家安全纳入工作视野。

全方位统筹，筑牢防范风险的铜墙铁壁。国家安全风险的联动性、跨国性、多样性日益突出。要统筹境内、境外布局，对内确保政治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对外推进国际共同安全；统筹网上、网下布局，完善网络空间管理体制，提高动态监测、实时预警能力，防止各类风险联动叠加，全方位筑牢风险防护网。

全手段运用，抢抓维护塑造的战略先手。新形势下安全问题的瞬变效应、混合效应、传导放大效应更加凸显。要综合运用一切手段防控处置，更加注重协同高效、法治思维、科技赋能、基层基础，以创新转化应用经

济社会发展成果，推进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手段方式变革，加快实现向事先预警、快速反应、主动塑造转变。

全社会动员，汇聚人民战争的强大合力。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是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优势的鲜明体现。要始终把人民作为国家安全的基础性力量，增强全民国家安全和素养，不断巩固国家安全人民防线，打造责任共担、风险共治、成果共享的国家安全共同体。

切实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职责任务

维护国家安全的领域宽广、任务艰巨。我们要坚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立足国家安全机关职责，深入开展反颠覆、反霸权、反分裂、反恐怖、反间谍“五反斗争”，切实筑牢国家安全屏障。

打好反颠覆保卫战。对外筑起维护政治安全的钢铁长城，高度警惕反华敌对势力西化、分化图谋，严厉打击境外渗透、破坏、颠覆、分裂活动，坚决防范抵御“颜色革命”。对内铲除影响政治安全的土壤，守好互联网、高校等意识形态阵地，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思潮，严防各类风险向政治安全领域传导。

打好反霸权总体战。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全球安全观，反对“筑墙设垒”“脱钩断链”，反对单边制裁、极限施压，坚决与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作斗争。坚定办好自己的事，健全反制裁、反干涉、反“长臂管辖”机制，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做到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

打好反分裂主动战。坚定反“独”，坚决挫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图谋，反制外部势力干涉行径，依法惩治充当“台独”“马前卒”的

台湾间谍人员，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全力“促统”，壮大爱国统一力量，厚植和平统一的民意基础，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为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作出战略战术贡献。

打好反恐维稳阻击战。严打境内暴恐活动，坚持凡“恐”必打、露头就打、依法严惩，加强风险排查联防、重大安保联控、重大专案联打，守住境内不发生暴恐案事件的底线。严防境外外恐袭风险，健全涉我恐袭风险预警机制，深化反恐国际合作，推动关口前移，强化源头治理，切实维护海外公民、机构、项目安全。

打好反间谍攻防战。组织强大攻势，持续开展反间谍专项行动，健全反间谍工作协调机制，深入实施新反间谍法，全面提升依法打击能力，坚决砍“钉子”、除内奸。强化立体防范，加强重点对象、要害部位保护，推进12339等线索举报平台建设，压实各部门反间谍主体责任，筑牢守卫国家秘密安全的坚固防线。

不断强化维护国家安全的坚强保障

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维护新时代国家安全，是一项系统工程和长期任务。我们要善于发挥制度优势，加强组织领导，创新体制机制，采取有力措施，不断强化国家安全工作的体系性支撑和基础性保障。

做强政治保障，强化党的领导“主心骨”。把握政治方向，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发挥政治优势，坚决执行中央国安委主席负责制，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凝聚政治力量，发挥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调动全民维护国家安全的积极性主动性。

做优体制保障，构建实战实用